



[德]特奥多尔·蒙森○著
严晓朦 李娟○译

RÖMISCHE GESCHICHTE

罗马史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罗马史

第五卷

〔德〕特奥多尔·萨杰 著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第五卷 / (德)特奥多尔·蒙森著;严晓朦,
李娟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29-11681-1

I. ①罗… II. ①特… ②严… ③李… III. ①古
罗马—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309号

罗马史 第五卷

LUOMA SHI DI-WU JUAN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严晓朦 李娟 译

责任编辑:刘嘉

责任校对:郑葱

版式设计:卢晓鸣

封面设计:严春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22.75 字数:550千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681-1

定价:8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他如此环视四周，
这事在他脑海里翻滚，
他该如何诉说这一切？
他该如何将涌现的事联系起来？
他该如何保持精力旺盛
笔耕不辍地撰写？”

——歌德



目 录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多留	1
第二章	
苏拉的复辟政治	40
第三章	
寡头政治的覆灭和庞培主政	101
第四章	
庞培和东方	131
第五章	
庞培外出时期的党争	183
第六章	
庞培的退隐与争权者的联合	219
第七章	
平定西方	244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345
第九章	
克拉苏之死与共同统治者之间的决裂	386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和塔普苏斯	424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525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	648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 昆图斯·塞多留

反对派法学家对改革平民党持友好态度

苏拉逝于罗马纪元 676 年（即公元前 78 年），当时他恢复的寡头政府完全掌控着整个罗马国家。但这个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仍需诉诸武力才能在无数潜在或公开的敌人面前捍卫自己的地位。对抗它的并不是某个有明确目标并隶属于公认首领之下的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他们被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大相径庭的目的，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这其中包括拟订法律的法学家，他们既不参政，也丝毫不了解政治，但对苏拉独断专行地处置公民的生命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即使苏拉在世时，所有的反对派都噤若寒蝉，这些严肃的法学家就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摄政。例如，剥夺了各意大利公社罗马公民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司法裁决中全部被视为无效。同样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后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并未丧失公民权。旧时元老院中的少数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们以前致力于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达成妥协，现在则秉承同样的精神对平民党作出让步，以改良苏拉那种强硬的寡头体

制。更有甚者，在所谓的平民党中，那些真诚笃信而心胸狭窄的激进分子，他们曾为了如今的党纲口号而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在胜利之后，却悲痛地发现他们所奋斗以求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一句空话。他们的特殊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虽然没有废除他们的权力，但剥夺了其最重要的特权。由于这种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用途，且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因此保民官的权力对于民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仅仅是保民官这一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人数众多且位高权重的阶级对苏拉的复辟感到不满，他们的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损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属于反对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于罗马纪元 665 年（即公元前 89 年）授予的拉丁权只是所有罗马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样做容易引起骚乱。属于此类的还有自由民，他们人数众多，资产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为可畏。复辟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之前无实际作用的表决权地位，对此他们感到无法忍受。许多大资本家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谨慎小心，保持缄默，但仍似往常一样怀有满腔的怨恨，掌握着坚不可摧的势力。首都的民众意识到只有白送粮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满。受到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如庞培人一样，财产被苏拉的殖民者所剥削，并与后者同处一座城墙之内，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纳人 (Arretines) 和沃拉帖雷人 (Volaterrans)，虽实际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头顶似乎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被

罗马人没收土地的危险。尤其如在伊特鲁里亚，留守故地的人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沦为盗贼。最终，那些平民党首领有的因复辟而丧命，有的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队中，饱受流亡异乡之苦，他们所有的亲属和自由民都开始躁动不安。由于紧密的家族联系主宰着当时的政治见解，因此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了维护脸面，^①就必须设法使流亡在外的亲属获得回归国土的特权。如果亲属不幸客死他乡，他们至少也须尽力将那沾在其遗属及子孙身上的污点抹去，并将祖传的产业归还给其子孙。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摄政者贬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实质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唤，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现有的秩序。

破产之徒

反对派除以上各部外，还加上了全体的破产之徒。这些乌合之众不分贵贱，将其全部资产通通挥霍于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其中有高官贵族，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士兵，他们虽能依据摄政者颁布的法令成为地主，却无法成为农民，当挥霍掉罪人的第一批遗产后，他们还渴望得到第二批——这些人只顾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现有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帜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毫不关心。基于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并寻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于反对派。不仅有那些被严格封闭的贵族圈拒之门外、或至少没有快

^①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位名叫斯达伯·埃罗（Staberius Eros）的新自由民，他是个有名的文学教师，他允许罪人的孩子免费上课。

速升迁机会的人，他们因此试图冲入那座阵营，凭借人民的支持打破独断专行且注重资历的法律，还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其志向远不止于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来决定世界命运。唯一免于被苏拉封闭的合法反抗场所只有法学家的讲坛，尤其在这讲坛上，即使在摄政者在世时，这些壮志满怀的人就开始以正式法学和灵巧的雄辩术为武器，对复辟进行猛烈抨击。例如，出色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是地主阿尔皮努姆之子，出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凭借谨慎而又大胆的反对独裁行动骤然成名。如果反抗者想要的只不过是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得宝座，然后心满意足地稳坐其上，那这样的努力便无足轻重。毫无疑问，若此宝座无法满足一个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盖乌斯·格拉古已经后继有人的前提下，一场生死较量便不可避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

反对派的势力

以上所说的就是苏拉设立的寡头政府必须要对抗的反对派。苏拉死后，该寡头政府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比苏拉预料的要早。这项任务本就不易，当时社会及政治上的弊端又使其更加困难——尤其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军事首领服从于最高民政当局，另一方面，不仅要应付聚居于首都的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籍人，又要应付首都那些实际上已获自由之身的奴隶，并且没有任何军队可供支配，实在是难上加难。元老院似乎处于一座毫无屏障、四面受敌的堡垒之中，严重的战事接连

发生。但是苏拉所组建的抵抗力量却也强大持久，虽然大多数国民都对苏拉创建的政府表示不满，甚至对其心存敌意，但面对那迷乱纷纭、既没有一致的目标和手段、又缺乏领导者且分裂为数百个派别的反对派，该政府却能在堡垒中长久自保。元老院必须有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至少要拿出一点建造堡垒的精力来保卫它。因为如果连卫戍部队都不肯自卫，那么即使有最出色的设防能手来修建城池也是枉然。

朋党组织缺乏领袖

严格来说，双方都缺乏领袖，因此一切事情越有赖于双方领袖的品质，便越是不幸。那一时期，政界完全被最为恶劣的朋党制度所控制，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各个家庭与社团的紧密结合原本与贵族政体密不可分，且数百年来都盛行于罗马，但那时它们开始变得所向无敌，到了现在（始于罗马纪元 690 年，即公元前 64 年），它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因法律禁令而有所减弱，却因这种禁令而更加有凭有据。

所有贵族，无论是倾向于平民党的还是真正的寡头党，都结成帮会。同样的，只要是经常参与政事的公民大众，也根据他们的选举区组成几乎与军事组织无异的紧密团体，将区长即区分配官作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些政治团体中进行交易，尤其是选民的表决权，除此之外还有元老院议员和法官的表决权，以及引发街头暴动的打手和指挥暴动的头目。上流阶级团体与下流阶级团体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价目表的差异。帮会操纵选举，帮会进行弹劾，帮会还组织辩护。它不仅聘请了有名望的律师，而且与靠大规模买卖法官表决权

而暴富的投机商人签订合约，以在必要时获得赦免。帮会凭借团结紧凑的群体控制着首都的街市，又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国。这一切都按照某种规则进行，也可以说是公开进行着。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帮会制度要优于其他任何行政管理机构。虽然人们对于不法行为都会心照不宣地避免直接提及，但没有人会隐瞒包庇，有名望的律师也不会因公开表明自己与顾客所属帮会的关系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违背这样的原则却仍参与公众生活，那么这个人就如马尔库斯·加图一样，必定是个政界的堂·吉诃德。党派和党派斗争被社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政治被阴谋诡计所取代。有一个颇为可疑的人物，名叫普布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 Cethegus），他先前是一名最为积极的马略党，后来投奔苏拉，颇受重用，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狡猾的告密者，游走斡旋于元老院各派之间，掌握各党的秘密阴谋，有时根据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话，他就能知道最重要将领的任职命令。只有当参政之人的才能极为平庸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困境，任何才能出众的人都会如扫蛛网一样扫荡这种朋党，但那时最为缺乏的正是具有政治或军事才能的人。

腓力普斯、梅特路斯、卡图卢斯和卢库勒斯

在内战中幸存下来的老一辈，颇具名望的只剩下精明老成而又口才过人的卢奇乌斯·腓力普斯（Lucius Philippus，于罗马纪元 663 年，即公元前 91 年任执政官）。他之前曾倾向于平民党，后来领导资本阶级对抗元老院，并与马略党关系密切，最后又转而投奔取胜的寡头党，博得感激和称赞，得以在两党

之间保全性命。在下一代中，最著名的贵族领袖有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于罗马纪元 674 年，即公元前 80 年任执政官），他与苏拉并肩奋斗，同甘共苦；有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于苏拉去世那年——罗马纪元 676 年（即公元前 78 年）任执政官，是得胜将军维尔塞莱之子；还有两位年轻的军官，即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勒斯两兄弟，前者在亚细亚，后者在意大利，同隶属于苏拉部下，战功赫赫。且不说像昆图斯·霍腾西乌斯（Quintus Hortensius，罗马纪元 640—704 年，即公元前 114—前 50 年）这样的贵族，仅仅在辩护时才能发挥一点作用；更不用说于罗马纪元 677 年（即公元前 77 年）任执政官的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Decimus Junius Brutus）和马莫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李维亚努斯（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等无能之辈了，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贵族式的名字。

但即使是那四个人，也比不上当时平庸的贵族。卡图卢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位高雅正直的贵族，但资质平平，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仅人品可敬，还是一位才能出众且经验丰富的军官。罗马纪元 675 年（即公元前 79 年），在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后，他被派往西班牙，当时卢西塔尼亚人^①与昆图斯·塞多留率领的罗马亡命徒正在西班牙再度起事。他之所以被派往该地，并不是因为他与摄政者的关系甚密，而是由于其

^① 即今葡萄牙境内的伊比利亚人，公元前 2 世纪曾抵御罗马入侵。——译者注

公认的杰出才能。卢库勒斯两兄弟也是良将，尤其是哥哥，集军事才能和文化修养于一身，酷爱写作，为人也备受尊敬。但是，就从政而言，即使是这些较为优秀的贵族，其疏忽短视也不亚于当时的一般元老院议员。面对外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无疑显示出了出色的才能和过人的胆量，但没有人想要或者想出办法来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也没有人充当舵手，带领民族之船渡过那阴谋诡计与党派纷争的汹涌大海。他们的政治才能仅限于笃信寡头政治是救世的不二法门，痛恨煽风点火的恶劣行径和所有自谋解放的个人专权。他们没有很高的追求，一点琐事就能使其满足。据说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时，不仅喜欢西班牙应景诗人随意弹奏的不协调的七弦竖琴，而且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像供奉神一样，为他敬酒焚香。宴席上，胜利之神在假造的雷霆中降临，人们将胜利者的金冠戴在他的头上。这些事情与大多数历史逸事同样荒诞无稽，但这种传闻反映了后辈们堕落的野心。

即使这些较为优秀的人并未获得权势，只得到执政权、胜利和元老院的一个尊位，他们也感到十分满足。当他们壮志满怀，正要开始真正为自己的国家和党派作出贡献时，却退出了政治舞台，沉迷于皇室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像梅特路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这样的人，即使在任将军之时，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如何通过征服新君主和新民族来扩大罗马的疆域，而是如何获得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新美味，以增加罗马烹饪法中野味、家禽和甜点的种类，他们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虚度在了这或多或少有些创意的无用之事上。祖传的天资和个人的克己是所有寡头政治的基础，在当时日趋没落且依靠人工恢复的

罗马贵族中，这两种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们普遍认为，党派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爱慕虚荣就是满怀抱负，目光短浅就是始终如一。假如维护苏拉政治体制的人曾出席罗马红衣主教团或威尼斯十人会议，那么反对派是否能如此迅速地动摇其政治体制，我们就无从得知了。有这样的维护者，每次攻击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危机。

格涅乌斯·庞培

在那些对苏拉的政治体制既不绝对服从又不公然反抗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年轻的格涅乌斯·庞培，苏拉去世时他年仅 28 岁（生于罗马纪元 648 年，即公元前 106 年 9 月 29 日）。此事对于景仰者和被景仰者来说都是不幸的，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庞培拥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非常擅长运动，即使在任高级军官时也与手下的士兵比赛跳远、跑步和举重。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骑手和击剑手，为义勇队的一名猛将。这个年轻人在还不能任官职和入元老院的年龄，就已成为了最高统帅和得胜将军，且在民意调查中获得了仅次于苏拉的地位。不仅如此，宽容的摄政者还半承认半讥讽地授予了他“大帝”的称号。遗憾的是，他的天资与这些史无前例的成功完全不符。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只是个十足的普通人，他天生是个优秀的军士，当时的形势使其成为了将军和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智勇双全、骁勇善战的军人，即使就军事才能而言，他也没有任何更高的天赋。在做将军或其他事情时，他的特点是谨小慎微，近于胆怯。如果可能，他只有在占据极大优势时才会给敌人断然一击。他的修养就代表着

当时普通人的修养，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但当他到达罗德岛时，却没有忘记向当地的雄辩家致以赞赏和馈赠。他的正直与那些谨慎管理巨大资产的富人如出一辙。他并不排斥按参议员的常规方法来赚钱，但是他太过冷静和富裕了，因此不会为了这种事冒特别的风险，也不会自取其辱。他之所以能获得公正无私的美名，并不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美德，而是因为同时代的人都恶习盛行。他的“诚实面貌”几乎尽人皆知，即使在他去世后，也被尊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实际上，他是个好邻居，从未参与当时贵族的阴谋，如强迫卑贱的邻居出售田地或采取更加恶劣的手段来扩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儿的感情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当时还盛行一种野蛮的风气，即将俘虏的敌国君主和将军游街示众，然后将其处死，而庞培是废除这一陋习的第一人。

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做以下事情：他奉君主苏拉之命忍痛与爱妻分离，只因为她是罪臣之女；他还依苏拉的指示，非常冷静地令人将那些曾跟他患难与共，甚至向他伸出过援手的人处死。他并非凶狠残暴，虽然人们都这样责备他。但他无论是对待善行还是恶举，一概都冷酷无情，这或许更加恶劣。在战争中，他面对敌人，毫不畏惧；在生活中，他害羞内敛，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两颊泛红；当众发言时，他不免有些局促紧张，与人交际通常会稍显笨拙僵硬，无所适从。他固执傲慢，正如所有夸耀自身独立性的人一样，但在懂得如何运用他的人手里，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其支配的自由人和门客手里，他是一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最不适合做的就是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策略方法的能力，对待大小事务都目光短

浅，束手无策；他习惯将自己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隐藏在冷酷的外表之下，当他耍手段时，自以为欺骗了别人，而实际上只是欺骗了自己。由于他军事地位较高且与各地联系密切，因此就算无所作为也能得到大群私党的拥护，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便可以大展宏图。但庞培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领导和团结一个党派，如果党派始终保持团结一致，那也不是他的功劳，而是时势使然。这件事情如同其他事情一样，使我想到了马略，但马略虽然生性粗暴，却不及这位招人厌恶又呆板固执的假伟人那样令人无法忍受。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苏拉的部下，理应有义务维护恢复的政治体制，然而他不仅再次反对苏拉个人，而且还反对整个元老院。庞培一族仅在最近六十年来才被载入执政者名录，但在贵族看来尚未获得足够的地位。庞培的父亲曾对元老院抱有可恨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自己曾属于秦纳党（Cinnans），这些陈年旧事或许积压在人们心底，但尚未被遗忘。庞培在苏拉手下身居高位，因此他虽表面上与贵族来往，但内心却与他们不和。庞培头脑简单，又轻而易举地迅速登上了荣誉的巅峰，不免会感到头晕目眩。正如他将自己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相比，以嘲笑自身的无趣与平凡一样，他开始将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并自诩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似乎不仅仅是罗马五百元老之一。

实际上，没有人比庞培更适合参与贵族政治。他外表庄严，举止得体，勇敢无畏且私生活检点。如果他早出生两百年，或许他那缺乏主动性的性格能使他获得尊贵的地位，与昆图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Maximus）和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Publius Decius）平起平坐。平庸之才是真正的贵族和罗马